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前后的 官绅商学

章开沅 马敏 朱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前后的 官绅商学

章开沅 马敏 朱英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9-4

I. ①辛… II. ①章…②马…③朱… III. ①阶层—分析—中国—近代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40 号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主编:章开沅 马敏 朱英 ©

责任编辑:赵宏

责任校对:张晶晶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45.5

字数:7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12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导 言

章开沅

近代官绅商学研究虽然是列入国家社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然而却是我们长期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研究的继续，当然还远远不是这种研究的完成。

事情需要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记得是在 1964 年春天，为了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划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研究项目，我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同行的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颇有感触，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邵先生属于沉默寡言型的诚朴学者，平常少于言谈，但每有建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他显然是不满于流行一时的贴标签式的“阶级分析”，所以才提出这一发人深省的见解。当时，我也有类似感触，因为自 1962 年对张謇进行系统研究以来，也经常感到简单的阶级归类很难对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作出贴切的解释。1963 年我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中，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所接触。此后，我在撰写《张謇传稿》时，更初步形成张謇从下层社会群体向上层社会群体、从旧群体向新群体转化的思路。但由于 1964 年已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岁月，这一思路无从公开表述与讨论。

事隔 20 年，直到 1983 年 8 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才提起这件往事，并且郑重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迫切需要。会后，我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关于改进研究中国

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经由《历史研究》发表。此文强调两点：第一，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资本家称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即代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和企业个体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如资本集团、商会等）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清晰地得到表现。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与深刻，这是许多探索历史规律性的学者的共同认识。第二，推而广之，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的哪个领域和哪个侧面，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以生物学为例，个体的研究必须经过种、属、科、目、纲、门的逐次归纳分类、演绎和比较，然后才有可能获致对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整体认识。而且，个体内部结构有细胞→分子→量子诸层次，个体外部环境有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诸层次，其间同样也存在着许多规定和关系，因而也就决定了生物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人与动植物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及其间的多层次性则是共同具有的。我之所以强调集团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正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

此文还认为：个体与类型，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较小范围内的类型、一般、共性，在较大范围内则是个体、个别、个性；反之，在较大范围内的个体、个别、个性，在较小范围内又有可能是类型、一般、共性。迄至此，我用的都是“社会集团”而不是“社会群体”，但我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是一致的，即都是社会学所谓 social groups，这一点我在《张謇传稿》中早已表述得比较清楚。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中文版）对“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的界定是：“一个社会群体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现在是、曾经是或可望是有某种相互关系的一群人。群体或社会群体一词，过去用来指许多种人类集体。两个人的集体或一个大的民族国家的全部人口都可称为群体。但更多的是把这个概念使

用在更严格和有限制的范围内，即试图用上述的一般定义中的某一部分来规范群体的意义。”我们对社会群体一词的理解与运用，大体与此类似。由于群体是一个涵盖面较宽而又比较灵活的名词，所以在具体运用时必然有不同类型之分。大体说来，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运用的主要是模式化了的关系群体、结构性的社会单位和比较严密组成的社会单位，总之并非初始自然状态的群体。

多少是由于受我的影响，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中群体研究方法激发了年轻学者的浓厚兴味。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乐正对于清末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稍后又有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于晚清以来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

就我们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总体布局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侧重点是商会与绅商研究。这是由于当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加以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绅士”热也使我们不能不有所回应。但是，在商会与绅商研究过程中，逐渐增进了对绅商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理解，于是研究的视野与深度、广度都出现了新的扩展。如朱英就经由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也属于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探索。这些研究对于前些时海内外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的热烈讨论虽有所回应，但绝不是跟着西方学者惯用的理论概念兜圈子。我们有自己的研究途径与连续性，我们是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客观实在地陈述历史，进而在理论上寻求对历史的合理解释；或许可以说，我们的理论阐述是通过历史的归纳与演绎形成的，至少不会流于凿空的夸夸其谈。

“官绅商学研究”的立项，是我们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构思。早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张謇研究期间，我们发觉张謇当年曾把自己定位于“官商之邮”，而且在他访问日本以后已经提出需要正确处理“政、学、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原话是：“政者君相

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张謇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更不是社会学家，他不可能运用“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这类概念。但他从多年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兴办新式实业、教育的实践中，已经觉察到社会构成中有政、学、业（包括农、工、商）不同人群之分，这些人群各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功能与活动特点。他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希望在三类人群之间建立良性的、相补的互动关系。张謇对学者期望最高，期盼他们“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这不仅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精辟见解，即令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近代史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加拿大约克大学陈志让教授有关“军绅政权”的研究对我们也颇有启发。他的研究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转向政治军事史，后来又回到社会经济史，而在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始终想找一个答案——中国近代化的途中为什么有那么多荆棘。他是从军阀时期的政权结构剖析入手以寻找答案，人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个答案，但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而且他的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官、绅、军队三个群体。陈志让的《军绅政权》一书定稿于1978年在京都大学讲学期间，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来到武汉与我结交，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结构与互动关系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直到现今，他八十高龄还在研究当代中国留学生群体，体现出一位真诚历史学者探索终生的执著追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已经以较广阔的视野初步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曾、左、李、张等督抚群体，他们有权、有势、有钱乃至有兵，可以影响中央政府决策，并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大刀阔斧兴办各类新式企业、事业。二是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思想先驱群体，他们在幕府内外影响幕主，参与决策并制造舆论。三是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等科技官僚群体，他们已走出书斋或实验室，承担新式企业、事业的专业领导重任。四是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经营管理者群体，尽管旧官僚界对这些风云际会的颇有开拓型、经营型气质的新起官僚难以认同，但他们的作用极为重要，督抚群体的决策、思想先驱群体的观念、科技官僚群体的才智，都要经过他们的组织运营才能成为现实，成为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新式企业、事业实体，逐步为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最初的框架（见拙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至此，官、绅、商、学不同群体的各自活动轨迹与相互关系的探讨已是呼之欲出。

于是我们决定把“近代官绅商学研究”作为国家社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申报，并且拟定了分工合作的研究计划。现在作为最终成果汇总成书出版，其中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刘伟）、“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的人事嬗递与群体角色”（王奇生）、“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马敏）、“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林济）、“从商会看近代中国的官商关系”（朱英）、“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严昌洪）、“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社会功能”（罗福惠）、“近代官绅商学与宗教”（何建明）等八章。虽然这些还不足以涵盖官、绅、商、学诸群体的各个层面，但它们大体上已将晚清至民国期间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对人类最多的农民群体与出生最迟的现代工人群体存而未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这个课题并非全面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只是研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比较活跃并起先导作用的几个主要群体。工人阶级在很长时期处于自在状态，作为沉默大众的农民尽管蕴藏着雄伟的潜力，但毕竟不是社会革新或革命的主导者。

我为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写序时曾经说过：“作者没有着意刻画少数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精心勾画若干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如容克贵族、官僚集团、知识精英、独立经营者集团及稍后的职员集团、公职人员集团等等，包括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和沉浮荣枯。而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集团不是抽象的类型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动的特殊社会实体。因此，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绚丽画卷。”此书作者参阅了130种德文著作，所以上述这些精彩的内容体现了不少德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取向及其成就，这些见解与我们多年的学术追求颇有相近和相通之处。

我们还注意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工作特点。他们反对把个人当作历史分析的最后单位，反对政治史处于统治地位的旧史学，把军政首脑、部长、外交家等看作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批判‘事件史’

和‘战争史’，构成了呼吁研究人类总体史的前哨战，而这种总体史非常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状况。在这方面，法国历史学派之所以值得注意，也许是因为绝大多数著作都同社会史有关。群体、范畴、阶级、城乡、资产阶级、艺人乃至农民和工人，都成了历史舞台的‘集体’英雄。”（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9页）我们并不认为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无足轻重，事实上好些批判“事件史”、“战争史”的法国历史学者后来又向政治史“复归”。但是我们认为法国同行对“集体”英雄的强调毕竟是可贵的，虽然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延伸到农民与工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无论古今中外，历史总是前后连续的。那些曾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集体”英雄（社会群体），虽然不能原模原样重显于现在，但他们却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后世某些相对应的群体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而有些旧时的群体甚至能够历经岁月的沧桑而绵延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例如，古老的普鲁士容克贵族，不仅参与了欧洲大陆西北角新生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跟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使18世纪成为自己的“黄金时代”。此后，俾斯麦上台，利用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促使容克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之间结成一条战线，以求对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容克贵族因此又参与了德意志的统一与工业革命，分享了40多年和平发展的果实。在20世纪前40年，这个群体又随着德国的胜败兴衰和社会变迁而起伏沉浮，直至1944年7月才因为策动反希特勒的政变失败而走向自己的末日。三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上百名战功赫赫的将军，以及7000多名贵族精英分子走上断头台；在德国传统政治中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的贵族军官团，也就从“容克之花”终于沦为希特勒魔掌中的“死亡之花”（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6页）。

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我们自然更为熟悉官、绅、商、学这些社会群体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以及一百多年以来它们的形式与内容、角色与功能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最近我看到费孝通先生与李亦园教授之间的对话录。在谈到关心农民问题时，费先生说：“我是自觉地把自已放到农民里边去。可是实际讲起来，还不是真正的

农民心理，而是大文化里边的知识分子，是士绅阶级，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类学》，载《炎黄文化研究》，1999年，第12期）从前后文的语气来看，费先生显然是讲自己的过去（1949年以前）。但想到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秉承一贯的“志在富民”，风尘仆仆奔走于大京九沿线，希望把自己的“糖葫芦理论”付诸实践，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加速发展，我认为现今费先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仍可视为“士绅阶级”的延续。士者，社会学家也；绅者，退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一身而二任焉。从近代中国历史来看，官、绅、商、学并无截然的分界，或官绅、或士绅、或绅商、或官商、或儒商，常多复合形态，乃至兼官、绅、商、学于一人（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等）。马敏把这种现象称为缺乏明晰边界的粘连性，“所谓粘连性，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带水，分化不充分”（《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我们丝毫无意做简单的历史类比与附会，但社会群体的前后连续性显然是存在的。历史上活跃过的群体，绝不会在同一时间全部消失，其中必定会有一部分遗存于后世，或表现于躯体，或表现于灵魂，或保存基本完整，或只剩下残余，千姿百态，光怪陆离。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令是比较完整遗存下来的旧时群体，也必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有不同程度的自我调适与相应变化，否则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我们希望通过官、绅、商、学的研究，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这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的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在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它们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包括正面的与负面的作用；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只有理清这些关系，才能引导它们逐步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更为健康地发展。当然不能说过去的统治者完全没有认识这种必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性格的局限，他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而这也未尝不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荆棘丛生的根源之一。就在20世纪初，集官、绅、商、学四者于一身的张謇，在访日之际已经察觉到晚清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角色错位问题。他说：“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

有官式。”（《东游日记》，癸卯五月十八日）但他并非主要归咎于政府，反而严格要求士大夫自身：“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张謇所说的士大夫，已经不复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士大夫，而是近代绅、学两个群体的复合词。张謇虽曾具有官的职衔，却对官具有商人群体本能的厌恶。访日归来以后，他曾就创办大学宗旨问题向端方有所建言：“鄙意所谓政界之人者官也。所谓大学者，养成可以为官之国民，不必尽为官也。无国民之知识而为官，今天下之官若是其多矣，其有益于国否？与其得多数无意识之官，不如得少数有意识之民。此则方圆之见各殊，不能苟于求同者也。”（《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张謇在这里所说的民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指的是绅、学、商各界中的知识精英。“学者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他们应该在政、学、业三者之间起重要的桥梁作用。

张謇不是历史学者，对晚清政、学、业及其相关社会群体的观察与论析也不尽正确，但他在将近百年以前的深沉思考至今依然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前人的历史经验，包括他们的深层反思，无论是总结其成功，还是检讨其失败，都包含着智慧，都是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我历来主张应该善于与古人对话，就是对古人经由沟通形成理解，从中吸取历史蕴涵的智慧。历史学家当然更应该成为把往昔与现实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然而，如果他们不首先学会与古人对话的本领，便很难说他们已经具备充当桥梁的必要条件。日本近代杰出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在离开人世以前仍然为日本人的浮躁与浅薄而忧虑。他认为日本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哲学，常识极其丰富而终究难以超出常识以上，所以只有一种小聪明、小机智，不适于建立伟大的事业。他希望日本人要做“极其正直的人，极其认真的人”，要像牛顿那样坚持不懈地思考（《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16页）。现在我国社会风气（包括学风）也正走向浮躁与浅薄，“创新”一词虽然响彻云霄，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仍不过停留于“小聪明、小机智”的层次，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民族最大的忧患。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多少能激发读者一些深层思考，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